

【论 文】

乌鲁木齐南山哈萨克族跨国移民调查

李 娜¹

摘要：自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哈国风”的兴起促生了新疆哈萨克族大规模的跨国流动与迁移。南山地区也受到了这一潮流的影响。本文通过对南山地区两个哈萨克族村的实地调查，具体选取乌鲁木齐县跨国流动人数较多、具有代表性的托里乡 Y 村、甘沟乡 G 村为田野调查点，考察了当地哈萨克人口迁移哈萨克斯坦的现状、动因，以及人口迁移对迁出地社会带来的诸多影响。期望引起学界对此问题的关注和重视。

关键词：哈萨克族 跨国移民 南山 哈萨克斯坦

近年来，迁居哈萨克斯坦已成为我国新疆哈萨克人口聚居地的热点问题，研究这一迁移现象及其深层次的缘由，关注迁移环境、生计、文化问题，减少人口盲目迁移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冲击，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南山地处乌鲁木齐市周边，近些年随着牧民定居工程的全面实施和旅游业的深入发展，当地的产业结构和社会结构随之发生变化。当前，乌鲁木齐县快速发展的旅游业与城镇化建设，使当地社会处于急剧的转型期，哈萨克族草原社会文化正在发生一系列深刻变迁。在这一社会背景下，考察当地哈萨克农牧民的跨国移民问题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很强的现实意义。据相关统计资料，从 1991 年到 2016 年 1 月 1 日，世界各地共有 261,104 个家庭、957,772 名哈萨克人“回归”哈萨克斯坦，其中 14.2% 来自中国。² 中国约有哈萨克族 146 万。³ 即中国哈萨克族移民人口占中国哈萨克族总人口的比例为 9.3%。根据南山哈萨克人口迁移的情况，田野调查点具体选择乌鲁木齐县跨国流动人数较多、具有代表性的托里乡 Y 村、甘沟乡 G 村⁴。

一、调查概述

据史料记载，清光绪十一年（1885），克烈依部的加斯达坂部落的 30 户哈萨克族人由阿勒泰迁来南山的水西沟、托里等山区操场放牧。民国六年（1917），由贾斯塔部落千户长带领一批哈萨克牧民从阿勒泰地区到达南山水西沟、甘沟、小渠子等牧区驻泊。至今，南山哈萨克族依然保持着较传统的哈萨克族语言和生活文化习俗。

2010 年末，乌鲁木齐县有 26 个民族，总人口约 9.4 万人。全县哈萨克族约 2.1 万人，占总人口的 25.4%，占少数民族人口的 46%。调查地点之一的托里乡 Y 村距离乌鲁木齐市约 75 公里，是一个传统牧业村，居民 240 户 1124 人，均为哈萨克族。2016 年全村人均纯收入 16423 元。⁵ 另一个调查点甘沟乡 G 村距离乌鲁木齐市约 80 公里，是一个以牧业为主，旅游业为辅的民族村，全村总人口 287 户，1190 人，其中哈萨克族 1171 人，占总人口的 98.3%。其余村民属于汉族、

¹ 作者为新疆师范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研究生，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² 《独立以来约 100 万哈萨克人移居哈萨克斯坦》，<http://www.yaou.cn/news/201609/27/19998.html>，亚欧网，2016 年 9 月 27 日。

³ 据中国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哈萨克族为 1,462,588 人。

⁴ Y 村搬迁哈萨克斯坦的家庭有 25 户，131 人，迁移人口占总人口的 11.7%。返回家庭 1 户，共 3 人。G 村搬迁哈萨克斯坦的家庭有 20 户，76 人，迁移人口占总人口的 6.5%。返回家庭 3 户，共 10 人。两村迁移人口平均占 9.1%。

⁵ 据当地村委会提供资料。



维吾尔族、柯尔克孜族、回族等 4 个民族，2016 年全该村人均纯收入 16378 元。¹

调查时间分为两段，分别为 2016 年 7~9 月和 2017 年 4~5 月。调查采用了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主要包括：问卷调查、深度访谈。调查问卷共计发放 210 份，收回有效问卷 190 份。受访者大多为外迁哈萨克斯坦者在南山两村的亲属，均为哈萨克族。

二、外迁人口特征

南山两村外迁人口的迁移时间、年龄结构、性别结构、文化程度、职业分布及经济状况、迁移方式等基本特征如下：

（一）移民活动主要集中在新世纪前十年

问卷调查显示，在 Y 村的 49 名移民中，本世纪外迁的有 43 人；上世纪 90 年代移民的有 5 人；70 年移民的只有 1 人。结合访谈资料发现，大多于外迁在 2000 年以后发生。据访谈可知，G 村的外迁时间也主要集中于这一时期。因此，2005-2007 年为南山移民外迁的高峰期。自 2007 年至今，外迁趋势明显下降。主要还是由于当地城镇化建设步伐加快，农牧民经济收入逐渐增加，住房、医疗等基本生活条件逐步改善，水、路、电、通讯等现代化基础设施水平不断提高，特别是近几年民生的大力改善，稳定了民心，抑制了人口外迁活动的上升，但是未来依然存在一定的变数。

（二）以中青年、文化程度较低的人群为主

表 1：两村外迁人口特征表

	年龄				性别		文化程度				
	60 岁及以上	45~59 岁	20~44 岁	19 岁及以下	男	女	本科	高中	初中	小学	学龄前儿童
Y 村	12	33	79	7	63	68	1	10	67	51	2
G 村	6	23	35	12	43	33	3	4	36	32	1

数据来源：两村村委提供资料。

在两村外迁人口中，年龄均以 20~44 岁的中青年人为主，其中，Y 村占移民人口的 60.3%，G 村占移民人口的 46%；均以初中和小学文化程度为主，其中，Y 村占移民人口的 90%，G 村占移民人口的 89.5%。

（三）以中上收入的牧民群体为主

问卷调查数据显示：在 190 名受访者中，有 120 人表示其亲属在迁移哈萨克斯坦之前主要从事放牧，占总人数的 63.2%，比例最高。其次为个体经商者（23 人，12.1%）及学生群体（19 人，10%）。这说明，绝大多数外迁群体为牧业人口。这与访谈资料获得的信息一致，即南山外迁群体主要是后山牧业人口。

据调查，移民人群主要是经济收入中上等的家庭。KMX（女，55 岁，高中，Y 村村民）说：“搬走的都是些有钱人，到那里安居等都需要很大一笔钱，手上有钱的一部分人走了。”Y 村党支部副书记说：“困难户办个护照都难，别说搬迁了。由国家给的低保养着呢，还跑到那里干啥呢，在那边也没有生存能力啊。”ADLBK（男，54 岁，初中，G 村村民。）说：“弟弟 2008 年去了阿拉木图附近的农村放牧，那里经济条件不太好，当地政府不管不问。他们入了哈萨克斯坦国籍，拿了安家费。弟弟让我去看一看，但我不会搬，搬家也得有钱，最大的困难就是没有钱，到那边得买房子。”显然，经济条件成为制约迁移行为的基本因素。调研中，很多农牧民都感慨即使从

¹ 据当地村委会提供资料。

山上搬迁到山下都不容易，需要一定的经济条件，何况是从一个国家搬到另一个国家。

（四）在移民链中以亲缘关系为主导

迁移人口的亲属网络支持：问卷调查数据显示，在 190 名受访者中，投靠亲属搬迁者有 99 人，占总人数的 52.1%，非投靠亲属搬迁者 91 人，占总人数的 47.9%。因此，一半以上的外迁者获得了有亲缘关系的移民网络的支持。

H（男，大学，托里乡干部。）说：“我们哈萨克人部落观念重，七代人之内不能通婚。以前是游牧生活，同一个部落的就是亲戚。这边人到那边基本都是先找亲戚，然后了解对方的生活和国家政策，如果感觉那边好的话，就搬去过了，这样一个传一个，一家吸引一家。”JNT（男，38 岁，高中，Y 村村民。）说：“牧民基本是跟着亲戚出去的多，因为没有去过哈萨克斯坦，得先跟那边的亲戚联系。现在都是先找亲戚去玩，了解情况，好的话才走。”

移民网络是社会关系网络分析，是一系列人际关系的组合，其纽带可以是血缘、乡缘、情缘等。郑一省认为，相对于汉族移民而言，居住在国境线上的广西、云南少数民族由于与邻国的同源民族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当他们在这一侧生活不如意时，则会投向邻国的亲友，所以亲缘关系是少数民族移民链中一个很重要的特征。¹ 朴光星也认为上世纪 90 年代以探亲形式走出国门的朝鲜族并没有“各自为政”。而是在移居地形成了形形色色的新的城市族群共同体，并通过血缘、地缘等关系网络建构了全球性社会网络。²

表 2：共同搬迁哈萨克斯坦的家庭数量

	人数	百分比 (%)
一个家庭	116	61.0
两个家庭	43	22.7
三个家庭	11	5.8
四个以上家庭	20	10.5
合计	190	100.0

表 2 显示：在 190 名受访者中，“一个家庭”搬迁的占 61%，即外迁者以一个家庭的搬迁方式的居多。也有个别的个人迁移，如子女就学，但绝大多数最终带动了家庭迁移。尽管哈萨克族氏族部落的亲属网络结构在迁移活动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一个家庭的小范围的迁移范围更能适应迁移活动，也减少了大家庭式的人数众多的迁移行为带来的成本和风险。

对于这些富裕的中青年移民群体而言，传统的亲缘关系是他们外迁的主要途径。亲缘关系是当地的重要社会资本之一，哈萨克族是由几十个氏族部落共同组成的一个民族，有着比较浓厚的部落意识和部落传统。当地移民基本以“探亲”、“旅游”的形式前往哈萨克斯坦，继而完成迁移行为。同时，中哈两国哈萨克族间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密切来往与互动，为我国哈萨克族外迁哈萨克斯坦奠定了更为紧密的网络关系，这种网络关系一旦建立便将发挥出更为积极的效果。网络理论从关系网络角度解释了南山哈萨克族目前迁移或有意迁移哈萨克斯坦持续不绝的原因。

三、迁移动因分析

（一）牧民不适应传统游牧向多元化生产方式的转型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后，随着游牧向定居进程的加快，以及生态保护、旅游及城镇化等对牧区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由于传统单一的游牧生业方式的不可持续性，经济方式多

¹ 郑一省，“广西和云南少数民族向海外移民的历史考察”，《暨南学报》2014 年第 7 期。

² 朴光星，“跨国劳动力流动与中国朝鲜族的全球性社会网络”，《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9 年 5 期。



元化的转型是必然的，而牧民对新的多元化的生产方式的不适应，是导致当地部分哈萨克族迁移的重要原因。

问卷调查数据显示：在对迁移原因的调查中，190名受访者中有83人表示，其亲属迁移的原因是为了“增加收入，改善生活”，占总人数的43.7%，排在首位，即表明外迁哈萨克斯坦的第一动因是经济原因；排在第二位的原因是“孩子的就业和发展”（48人，25%）；排在第三位的是“为了发展自己的事业”（36人，18.9%）。在当地经济结构转型的过程中，传统游牧生业方式逐步萎缩，多元化的生产方式虽然增加了收入途径，但由于部分牧民习惯于传统游牧生计方式，对新的多元化的生产方式不适应，从而引起人口迁移。

A书记（男，大专，Y村干部。）认为：“大部分搬迁的都是后山放牧的人，前山的少。他们的生活方式非常适宜草场广阔的地方，他们觉得那边空间大，这里草场小，感觉维持传统生计方式有压力。而且搬迁的都是大户，大户更想到国外找大的草场放牧。”AYMHMT（男，45岁，初中，G村村民。）说：“2005年左右搬到哈国的人多，主要那边草场大，收入好。这两年明显少了，主要是探亲、旅游的人多，因为这里的政策好了，牧民的收入比过去增加了。”

因此，大部分搬迁的牧民家庭是由于经济原因，是为了提高经济收入，寻求更广阔的牧场，追求更好的生活。在“退牧还林”、“退牧还草”，以及南山旅游开发的政策主导下，哈萨克传统的游牧经济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和冲击，而哈萨克斯坦丰富的草场资源恰好可以满足牧民维持传统生计方式的需求。传统游牧方式的转型是大势所趋，已有不少农牧民在积极参与旅游业，在现代产业发展过程中做出了适应性的转变。但是，依然有一些农牧民不能适应新型产业，因此，这部分牧民自然将目光投向了传统产业空间较大的邻国哈萨克斯坦。

ADLH（男，56岁，初中，G村村民。）说：“那边草场大，这边草场少，国家收回了不让放牧，虽然给补贴，现在的生活有保障，但后代靠什么生活呢？我们很担心。孩子打工身体受不了。如果冬窝子不收回，还能放牧，我们就不走，要收回，就要搬走。”至今仍有不少牧民不仅因为缺乏其他生存技能，更是因为始终固守传统观念，面对经济社会的变化而难以适应。传统文化中哈萨克牧民轻商重牧，比较轻视商人和商业活动。但是随着经济生产方式的转型以及生活水平的提高，轻商观念逐渐发生了改变，一部分牧民开始从事旅游业。但在旅游业经营中，部分牧民不具备现代工商业所需的专业知识、技能、经营理念，缺乏信息、资本等，传统价值观念的转变更需要一定的过程。因此，大多数农牧民短期内难以适应，在G村旅游景区，不少哈萨克人将毡房转包给外来的回族、汉族经营。

（二）教育收费对南山牧民的影响

近些年，国家和政府在牧区教育上大力投入，极大地提高了哈萨克族人口的文化素质，其成效有目共睹。但是，2000年前后高等教育收费过高，使部分南山哈萨克牧民负担过重，尤其对多子女的牧民家庭形成不小的压力，这成为牧民搬迁哈萨克斯坦的主要原因之一。

STNHL（男，65岁，小学，G村村民。）说：“我家2015年9月从哈萨克斯坦回来的，儿子成家了不愿搬，想念儿子就回来了。两个女儿上完学留在那边了。2010年5月搬到阿拉木图州的塔里德库尔干，养了200只羊，又给别人代牧放羊。因为哈萨克斯坦上学免费，在这边上学家里供不上。我弟弟家先搬走的，他有五个孩子，上学也供不上。”这种说法在牧民中较为普遍。近年，随着教育优惠及高中免费政策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牧民的教育费负担。

其次，牧民很注重哈萨克语言和传统文化的学习，部分人认为学校中母语课程设置太少。GLZL（女，38岁，高中，Y村村民。）说：“以后为了孩子的发展可能会去那边。现在学校只有一门课教哈萨克语，小孩子逐渐忘记自己的语言了。孩子上四年级，汉语很好，但我们哈萨克族的语言、习俗等方面都不知道。虽然我们也给孩子教哈萨克语，但不太会写。”此外，还有牧民认为，一些教师、干部也将子女送往哈萨克斯坦就学、工作，这对普通牧民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和导向作用。

哈萨克牧民普遍认为，哈萨克斯坦更有利于本民族语言和传统文化的保留，因此，除了谋求发展外，考虑子女教育则是今后牧民迁移或有意迁移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牧区传统社会环境变迁带来的不适应

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大规模牧民定居工程的推行，不仅改变着牧区的自然生态环境，也正在改变牧区传统社会环境。游牧民定居事实上是一个与他们传统社会文化存在重大差异的再社会化过程，冲突和适应是再社会化过程中最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¹

其一，贫富差距日益拉大。

Y村和G村的牧民已基本转入定居，Y村以牧业为主，半牧半工；G村以牧业为主，旅游业为辅。大多数牧民将各家的牲畜集中起来，由少数人代牧。因而，牧区中有大量劳动力从繁重的牧业生产里摆脱出来，成为富余劳动力；实现定居以后，由于村落、城镇及旅游业的发展，为牧区富余劳动力从事第三产业创造了条件，从而使得一些牧民转而成牧民工或商人。截至2017年6月，Y村牧民经营牧家乐旅游点的有6户，开商店的有4户，开餐馆有2户。G村牧民经营旅游毡房的有80户，开商店的有3户，开餐馆有2户。因此，牧民、牧民工、商人，以及公务员、医生、教师等各类技术服务人员构成了当地哈萨克牧区多元化的社会阶层结构，社会阶层的多元化必然带来收入差距拉大，这对于传统计划经济意识、“等靠要”依赖思想依然较重的农牧民的冲击很大。

其二，民间传统权威逐渐衰落。伴随着经济生活的多样化以及社会阶层的多元化，哈萨克牧区传统的习俗和思想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哈萨克族具有浓厚的部落意识，一直以来，族长在传统牧区社会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对牧区传统社会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以定居为核心的牧区经济结构的日益深刻变化，对传统社会组织和制度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和影响。

问卷调查数据显示：在190名受访者中，认为定居以后，氏族部落中老者的权威“大不如以前”的人数最多，有122人，占总人数的64.2%。这说明传统权威在牧区社会的影响力受到很大的冲击。今日的哈萨克牧区社会，人们虽然依旧保留着氏族部落记忆，实行严格的氏族外婚制，男女如果是属于同一部落的，要结婚则必须要超出七代之外，以此来维持同一氏族部落的认同和不同氏族部落的区分。但部落组织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其他方面产生的影响已很小，在牧区哈萨克人的社会政治生活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乡(镇)、村。牧区社会资源的保护与分享主要是以核心家庭、村民小组、乡村为边界，而非氏族部落的边界区分。

HMEH（男，70岁，初中，Y村村民。）说：“以前阿克萨卡勒（部落长老）的权威很大，比如出现争地、分地等矛盾，得阿克萨卡勒解决。女儿出嫁下聘礼前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给老人说，要找部落中年龄最大的长辈商量彩礼等重要事情，长者说什么就是什么。现在是村长的权力最大，什么都听他的。”传统社会文化的转型已是不可更改的事实和趋势，尽管人们普遍赞同变迁带来了牧区社会各方面的发展进步，但也有人认为哈萨克族的优良传统在消失，特别是伴随着定居出现的一些负面影响给牧民带来了困惑。

其三，淳朴民风日渐式微。传统的新疆牧区社会民风质朴，友好互助。但是，对于定居以后牧区社会风气的一些变化情况，尤其是一些外来的不良风气对年轻一代的影响，很多哈萨克人持批评态度。² 部分人认为定居以后，不少年轻人无事可干、游手好闲。很多年青人打牌、喝酒、抽烟，甚至酒后打架、偷盗牲畜等，传统牧区社会的淳朴民风日渐式微。

HSY（男，67岁，初中，G村村民。）讲述了自己把儿子送往哈萨克斯坦的缘由：“2007年儿子初中毕业后去了哈萨克斯坦，在阿拉木图市做布料生意。儿媳妇家是伊犁搬去的。当年这里环境不好，年青人要么打牌，要么喝酒。儿子初中毕业后在家呆了几年，继续呆在这里就学坏荒

¹ 崔延虎，“游牧民定居的再社会化问题”，《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

² 王欣，“当代新疆牧区社会文化的变迁——以哈萨克族牧区为例”，《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



废了，我决定让他出国打工，他妈妈家在那边有亲戚。”于是，正如案例中的父亲一样，一些哈萨克人处于对下一代的身心健康和发展考虑，决定移居哈萨克斯坦，期望从哈萨克斯坦的亲友那里为下一代寻求到更好的发展环境和机遇。然而，事实上，农牧民很难全面了解哈萨克斯坦国家和社会，很难适应当地俄罗斯文化长期渗入的社会文化环境。

（四）中亚及周边国家的影响

陈勇认为：“宗教和民族回归是 90 年代初永久性国际人口迁移的新浪潮……目前，世界上一些国家虽然不是移民国家，但欢迎那些与本国民族、文化和宗教有渊源关系的人回国定居。”¹ 这一观点也适用于哈萨克族跨国移民现象。

其一，民族认同。1991 年苏联解体，哈萨克斯坦独立建国。独立后的哈萨克斯坦召开了世界哈萨克人代表大会，号召世界哈萨克人“回归历史祖国”，发起了“回故乡运动”。为此，哈萨克斯坦制定实施了一系列的移民政策。这犹如一只无形之手，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拉力，激荡着哈萨克人。中国的哈萨克族也受到了这一历史潮流的影响。SLM（男，26 岁，大专，G 村村民）直言道：“村里一些人去是因为他们觉得哈萨克斯坦是哈萨克族自己的国家”。“共同体的追寻”——寻找认同与故乡——是“人类的境况”本然的一部分。² 无论是依靠族裔、血缘、地缘等具体的社会事实联系在一起，还是基于民族主义散布之下形成的“想象的共同体”，哈萨克斯坦对哈萨克人来说易于产生民族认同。尽管哈萨克移民在哈萨克斯坦也存在文化适应的困境，但“想象的共同体”作为认同的力量对人口移动起着重要作用。

其二，哈萨克斯坦移民优惠政策的大力支持。哈萨克斯坦独立后，对迁入哈萨克斯坦定居的同胞予以安置，提供优厚待遇，这就成为我国哈萨克族外迁的一大诱因。哈萨克斯坦 2016 年新修订的移民法规定，外籍同胞有权选择移民目的地，不管定居何处都能取得回归者待遇证书。自获得定居权之日起一年内，可提交入籍申请，提交入籍申请后 3 个月内将取得国籍。外籍哈萨克人落户政府指定的地区，将获得当地政府的配额补贴。政府还将向落户指定地区的移民家庭提供住房，对年轻家庭提供宿舍。住满 5 年后，住房可转入居住者名下。³ 机构理论认为一旦迁移行为开始，会被提供一系列服务并从中获益的相关移民机构所推动。哈萨克斯坦及移民管理局在国外哈萨克族迁移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加速并扩大了迁移人群的速度与规模。

其三，哈萨克斯坦资源环境、社会福利政策的吸引力。哈萨克斯坦地广人稀、资源丰富，社会福利制度较为完善。

首先，优越的资源、环境对牧民产生了很强的吸引力。很多牧民迁居哈萨克斯坦，据说是因为那里有更大的草原和牧场，哈萨克斯坦给了牧民巨大的想象空间，在笔者调查的村庄里都流传着这样的说法，而且，随着日趋频繁的赴哈探亲旅游活动的展开，这种说法被不断地传播和证实，更加激起了人们的想象和迁移热情。

问卷调查数据显示：在 190 名受访者中，有 116 人（61.1%）认为哈萨克斯坦的生态环境“好”，因此，大多数受访者认为，与之前居住生活地相比，迁移者移居的目的地哈萨克斯坦的自然生态环境优于南山。这不仅代表当地环境优美、空气清洁，更意味着丰富的草场资源，这几乎是吸引牧民的首要因素。GLZL（女，46 岁，初中，Y 村妇女主任。）告诉笔者：“这里禁牧，牧民都买草料喂羊。在定居点，等秋天收了庄稼，牧民租上地放牧，一亩 3300 块。那边五六月草长的特别深，草场大，环境好，果树多，资源特别丰富。这里草场小，不能越过邻村的边界线。”传统牧业村的 Y 村，牧民世代以放牧为生，不具备其他职业技能和经验。哈萨克斯坦地广人稀，资源丰

¹ 陈勇，“当今永久性国际人口迁移现状及其特点”，《人口与经济》2000 年第 2 期。

²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2011，《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 17 页。

³ 《新修订的移民法为外籍哈萨克人回国扫除障碍》，哈萨克国际通讯社，2016 年 1 月 14 日，http://www.inform.kz/cn/article_a2859915。



富，外来资本对环境的影响和冲击较小，农牧区发展程度相对较低，生态环境保护较好，由此可以继续维持传统生业方式而受到牧民的向往和青睐。

其次，社会福利保障政策更为完善。当前，国内高等教育费用偏高、就业难、医疗保障程度相对较低等，这与哈萨克斯坦的社会保障制度形成了一定差距，这对牧民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和刺激效应。正如 KMX（女，55 岁，高中，Y 村村民）所说：“Y 村是自治区贫困村，牧民主要考虑子女发展和医疗，那边一个孩子从出生到大学毕业都不用掏钱，看病不用花钱，这两块就很有吸引力。”

调查中，牧民普遍对哈萨克斯坦的教育和医疗交口称赞。哈萨克斯坦的医疗免费政策的确对牧民有不小的吸引力，但是除阿斯塔纳市和阿拉木图市之外，其他地区的医疗水平和技术并不能企及疆内的医疗机构也是事实，因此部分牧民反映其亲属有时还要回到新疆的大医院就医；其高等教育也并非如牧民所言是完全的免费教育，而是需要达到公费的考试标准才能享受，大学中的公费名额只占生源的 25%。根据最新移民法，大学奖学金名额的 2% 留给国外哈萨克人。尽管如此，牧民们总是愿意选择性地接受外来的相关信息，将对方国家的教育、医疗的优惠政策口口相传。

再次，哈萨克斯坦实行鼓励生育政策，中国因特殊国情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这对传统生育观念依然较重的牧民来说形成了较大的反差和较强的吸引力。

JSLT（男，53 岁，大专，托里乡工作人员。）说：“大哥家 2006 年去了阿拉木图，母亲、哥嫂和四个孩子共七口人。都是女儿，想生个儿子，这边有计划生育。而且四个孩子学费太高了，他掏不起。在那边放牧，原来在村也放牧。现在条件好，有房子，草场大，教育、医疗、生孩子都免费。现在村里想搬过去的人多呢。”

在调查中，无论男女，提起哈萨克斯坦的生育政策都津津乐道，政府给生育七个、四个以上孩子的女性分别颁发金牌、银牌，还能事无巨细地说出从女性怀孕到婴儿一周岁期间的各种医疗服务、生活补助政策。牧民的传统生育观念依然较重，哈萨克斯坦生育优惠政策也是不少牧民移民或潜在移民的因素，特别是亲属成功移民的示范性起到了很大的催化作用。

最后，本民族语言和传统文化的保护政策是吸引牧民的深层原因。哈萨克语是哈萨克斯坦的国语，语言、传统文化日益成为影响牧民迁移哈萨克斯坦的深层原因。

在 190 名受访者中，分别有 95.8%、94.7% 的人认为哈萨克斯坦在哈萨克族语言使用、传统文化保护方面很重视，人们对此方面的认可度很高，但这种简单的比较却忽视了两国国情和哈萨克语在中哈两国的不同地位。调查中，有部分牧民认为哈萨克斯坦主要是哈萨克人生活的地方，哈萨克斯坦学校不仅教授科学文化知识，而且还专门开设传统文化课程，移居哈萨克斯坦可以很好地保存自己的民族传统文化。

HLY（女，46 岁，小学，G 村村民。）说：“那边可以接受很好的教育和知识，保护好自己民族的语言和习俗。有些牧民去哈萨克斯坦是为了孩子学习，那边学习比较轻松，这里作业多，学习紧，那边只上半天课。在中国就是不停地上课，死记硬背，那边下午上手工课，制作凳子、扫把、画画、唱歌，这边只会读书。”近年来，迁移家庭更多地从子女教育考虑，举家迁居哈萨克斯坦。一方面，牧民认为国内教育资源紧张，就业竞争激烈；一方面认为哈国教育免费，提倡素质教育，并可以学习和保留更多传统文化。很多年青人对子女教育的期望更多，而将这种期望寄托在移居他们心目中比较理想的哈萨克斯坦。

四、人口迁移对迁出地的影响

（一）户籍管理难度增大

随着城镇化步伐的加快，人口流动日益频繁，人户分离现象在农牧区社会也极为普遍。户籍



在人们日常生产生活中的作用不断下降，但户籍作为一种管理手段，依然在政府管理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笔者在南山两村的调查中也发现这种现象比较普遍，部分外流数年或数十年人口的户籍仍然存在于当地的户籍管理系统中，外迁人口中均有一部分目前保持双重国籍，往返于两国之间，这就造成了事实上的双重国籍。对于当地政府而言，要解决涉及中哈两国的国籍问题，难度较大。特别是外嫁女不迁户籍，而事实上已经从嫁入地移民哈萨克斯坦，其情况更为复杂，管理更有难度。这种事实上的双重国籍不仅给地方政府带来了户籍管理难度，而且影响国家相关政策的落实，尤其是对返迁人口的户籍管理和政策落实存在诸多困难。随着中国社会福利政策的日益完善，对农牧区的优惠政策力度加大，而优惠政策的最终落实是以户籍为依据，户籍数据的不准确给农牧区各项工作的开展带来了很大的不便。

（二）易引发草场纠纷

人口迁移引起或存在潜在的草场纠纷。其一，家庭内部矛盾。调查了解到，个别家庭的父母搬迁至哈萨克斯坦后，将草场给了其中一个子女，其他子女因为对此有意见而发生家庭矛盾。移居哈萨克斯坦的牧民通常将草场地托付给国内的亲属代管或使用，还有个别人转租给他人使用。但有时因此在家庭内部成员之间产生纠纷，这种矛盾和纠纷往往通过协商易于解决。其二，村民间、村民与干部间的矛盾。村民和村干部对已加入外国国籍者继续享受国家草场补贴、转租草场有看法。移民家庭的草场承包合同为 50 年期限，受法律保护，承包期内谁也无权收回，其亲属因享受这部分草场资源而极力维护其权益，但其他村民则认为搬迁到国外取得外国国籍的人，则不应再继续享受国内的政策和资源，应当终止合同。若五十年期满后收回重新分配，易带来其他矛盾。针对当前牧区人口迁移现状，应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加快出台相应的管理政策和措施。

（三）返迁家庭安置问题

人口的盲目流动给地方政府带来了一定的管理和安置困难。其一，返迁家庭的生活安置问题。据调查，一部分人在国外过得并不如意，又会返迁回来，返迁的这一部分人原有的生产生活资料，如牲畜、住房等已出售并用于搬迁费用，返回后要重新获取生产生活资料，要重新享受中国的安居房等政策，这给地方政府增加了管理难度和社会成本。而且，对于保持“双重国籍”者，其安置问题能否妥善解决是事关跨国移民及两国关系的重大问题。据相关研究，在新疆阿勒泰等地区也存在类似问题，即返迁户面临重新入籍、谋生及社会舆论压力问题等。¹

其二，返迁家庭子女重新入学存在一定困难。因两国教育体制和环境的差异，返迁人员子女无法适应国内教育，致使无法重新入学，这不仅影响其个体发展，而且对人口素质和地方社会也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G 村返迁户 HTR，2006 年搬迁时儿子只有 5 岁，现在只会讲哈语、俄语，既不会汉语汉字，也不会中国哈萨克文字，当地中学无法接受其入学。

通过以上存在的问题可以看出，盲目的人口迁移给当地政府管理和牧民生活带来了负面影响。与以往相比，尽管当前牧区人口外迁更具理性化，但由于牧区哈萨克族亲属网络的迁移特性，人们对哈萨克斯坦的信息来源主要限于亲友圈，即使到哈国探亲、旅游，对当地的认识也与亲友的生活环境密不可分，对哈国当地社会缺乏较全面客观的认知，这就易于造成盲目跟风，盲目流动。为此，相关部门和机构应当加强政策宣传和管理，减少人口流动的盲目性，降低管理成本。

五、结语

近年来，南山哈萨克族跨国移民潮流有所下降，但未来仍然存在一定的变数。今后，随着南山的进一步发展、各项惠民政策的继续实施，影响人口迁移的经济动因将逐渐减少，但社会文化

¹ 阿依登，“浅析哈萨克斯坦中国哈萨克族移民的社会适应问题”，《伊犁师范学院学报》2015 年第 2 期。



和心理等深层次的动因则逐步显现。而这一影响因素也会因南山开发力度的加强，围绕资源开发和权力运作表现出的矛盾、冲突及调和等问题而被放大和凸显。由此可能引发跨民族问题，并对一带一路战略造成不利影响。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赴哈移民浪潮的起始阶段，牧区的迁移人群是以牧民为主流的劳工型移民。自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经过二十多年的人口外迁，以及哈萨克斯坦移民政策的调整，技术、投资、知识型人群将逐渐成为人口迁移的重要组成部分。高素质人口的流失必将对牧区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一定负面影响。为此，要积极采取措施，努力推动牧区经济社会发展，提高牧区经济文化水平，防止和减少高素质人口的流失。

参考文献：

- [1]张宏莉,杜翠琴,“哈萨克斯坦的境外哈萨克人移民政策”,《新疆大学学报》2005 年 7 月。
- [2]郑一省,“广西和云南少数民族向海外移民的历史考察”,《暨南学报》,2014 年第 7 期。
- [3]朴光星,“跨国劳动力流动与中国朝鲜族的全球性社会网络”,《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9 年第 5 期。
- [4]陈勇,“当今永久性国际人口迁移现状及其特点”,《人口与经济》2000 年第 2 期。
- [5]崔延虎,“游牧民定居的再社会化问题”,《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2 年第 4 期。
- [6]王欣,“当代新疆牧区社会文化的变迁——以哈萨克族牧区为例”,《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9 年第 4 期。
- [7]李娜,“乡村妇女职业教育促进哈萨克族传统社会文化转型——木垒哈萨克族自治县大石头乡调查”,《新疆社会科学》2010 年第 1 期。
- [8]陈怀川,“牧民定居村落发展动力分析——新疆和静县 X 村个案研究”,《新疆社会科学》2010 年第 4 期。

《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第 1 期-第 252 期均可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图书分馆网页下载：

<http://www.sachina.edu.cn/library/journal.php?journal=1>.

也可登陆《中国民族宗教网》<http://www.mzb.com.cn/html/Home/category/36460-1.htm>

在“学术通讯”部分下载各期《通讯》。

《通讯》所刊载论文仅向读者提供各类学术信息，供大家参考，并不代表编辑人员的观点。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中国社会学会 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本期责任编辑：马戎、王娟
邮编：100871
电子邮件：marong@pku.edu.cn

